

资政参考 敬请阅览

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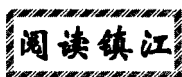
第 4 期

镇江市图书馆主办
ZHEN JIANG LIBRARY

2009年2月15日

本期 导读

- ☆中央强调提高执政能力需警惕“两面人”
- ☆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定期“下访”
- ☆事业单位养老试点改革
- ☆危机来了，文化咋办
- ☆部分官员学历渐高能力渐弱
- ☆杭州市政府制度化实施“开放式决策”
- ☆镇江构建学习型社会新平台
- ☆世人热议“中国模式”中国更应自警自检



镇江名人（十五）

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油化学工程专家——杨启业，1932年1月2日生于镇江，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因院校调整，1957年8月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炼制专业，分配到北京石油设计院（今中国石化北京设计院），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主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副总工程师。现任中国石化总公司北京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曾获得国家发明奖2项、科学技术进步奖4项、优秀工程设计奖4项；获中国石化总公司发明奖1项、科学技术进步奖8项、优秀工程设计奖6项。发表学术论文多篇。1990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启业自1957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炼油设计工作。40余年间他积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断在催化裂化装置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先后设计和审核了82套催化裂化装置，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为我国催化裂化技术的提高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设计技术负责人，参加了提升管催化裂化、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大庆减压渣油催化裂化、催化裂解等大量技术攻关工作。他主持设计的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200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采用了多项自行开发的先进工艺技术，如反一再同高并列，两段并立再生，全提升管反应，高效雾化喷嘴，专有的进料注入系统等，获2000年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1997-2000年又主持对该公司第二套80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进行了大庆减压渣油催化裂化成套技术开发及工业应用进行攻关，他针对大庆减压渣油的特点，集中了近年来发展的最新技术，采用了专用渣油催化裂化催化剂，活塞流提升管反应，提升管出口旋流式快速分离系统，高效雾化喷嘴，富氧再生，高效挡板、分段汽提，剂油混合温度控制技术，控制过度反应等先进技术。该项目于2001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其论文有《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新技术探讨》《我国第一台催化裂化可调热量下流式外取热器的工艺设计和标定总结》《60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重叠式两段再生技术设计开发与应用》等。

供稿：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

镇江构建学习型社会新平台

“对一座城市而言，知识是给予群众最好的精神食粮。”镇江作为人文底蕴深厚的文化名城，在努力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搭建起“领导干部新知识讲座”、“市民大讲堂”以及“理论热点面对面”等一系列层次鲜明、特色彰显的学习新平台，让镇江这座秀美的城市书卷气息愈加淡雅醇香。

在镇江的领导干部层，“白天忙发展、晚上抓学习”已蔚然成风。这当然得益于“领导干部新知识讲座”的举行。该讲座依托高层次的师资，讲授新颖前沿的内容，如今正逐渐成为全市党政干部拓宽视野、知识创新、思想解放的重要平台。

“新知识讲座”所突出的“新”主要体现在课题内容上，“新观点、新内容、新思考”更成为其显著的特点。经济学家吴敬琏、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俞孔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立言，南京大学张二震、裴平等学界名家先后做客该讲座。他们新颖而稳健的学术思想，让聆听讲座的全市县（处）级领导干部如沐春风，心灵和思想因得到新知新学的碰撞而变得更加聪敏健硕。

网络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美国金融风暴等专题，通过专家们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实现了学术观点与高层视角的结合。很多领导听完讲座后，撰写出了多篇观点精彩的调研报告。

2008年5月，作为惠民人文建设工程，市民大讲堂正式开讲。首场讲座的听课票在消息发布当日便被市民一抢而空，学术讲座竟也“一票难求”。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作了《汶川地震的人文思考》的精彩演讲，镇江市民也以阵阵如潮的掌声答谢了钱教授充满激情和睿智的讲演。

从2008年5月到年底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清史学者纪连海、心理学家周士渊、人口问题专家李工真、中医名家郝万山、先秦思想史学者姚淦铭……名家学者的纷至沓来，不仅带来了精辟独到的学术思想，更是带给了广大市民一道道精美丰盛的文化大餐。

由市委宣传部和镇江电视台联合创办的大型谈话节目——“理论热点面对面”的出现，令众多镇江观众耳目一新。这档电视节目一改“板着面孔说教”的面孔与腔调，以贴近群众、面向群众为着眼点，以电视媒体的语言，回答市民群众关心的理论热点，真正做到让理论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

——摘自《人民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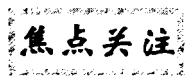
新华日报专访许津荣

“越是困难时期，越是镇江缩短差距、跨越发展的重要时期。参加省‘两会’，我们更加坚定了推进跨越发展的信心。”镇江代表团团长许津荣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镇江面临的机遇非常难得。许书记分析说，一方面，镇江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去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774 家，为近年来最多，仅有 26 家企业停产。另一方面，镇江的区位、岸线资源、产业优势进一步凸显，大项目落户的势头日趋强劲。所以，我们把今年的目标确定为“一个高于、一个快于”，即主要经济指标力争高于全省平均、快于沿江八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冲刺 1000 亿元。

围绕保增长促发展，镇江今年突出“四大建设”：一是重大项目建设。全力推进一批优质大项目，加快实施“千百亿”工程，推动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等五大优势产业加速向五千亿规模迈进。二是城乡建设。计划投入 400 亿元，大力推进南徐新城区、北部滨水区等一批重点工程，全面推进城市主要出入口和主要景区出入口环境整治，使城乡面貌显著改观。三是生态建设。咬定 2010 年达到国家生态市目标，力争年内全市 80% 以上乡镇达到环境优美乡镇，建成投运太湖流域 19 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中心城区污水管网覆盖达 80% 以上，新增绿化造林 16 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 2.6%，市区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力保 330 天以上。四是民生建设。政策扶持创业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5% 以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2% 以上，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全覆盖，突出抓好百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安居房的建设，实施 50 万平方米危旧房改造、40 万平方米老小区整治。

——摘自《新华日报》



中央强调增强党性具有针对性和迫切性

提高执政能力需警惕“两面人”

岁尾年初，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着重提出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强调“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党性问题”。

有关专家指出，党性与作风的关系是前者为本质，后者为表象。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作风。此次讲党性修养，就是着重从改善和转变作风入手讲党性，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

当前，与反腐败紧密联系的党员领导干部作风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工作作风漂浮，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一些干部漠视群众呼声，搞官僚主义，虚报浮夸，瞒上压下；一些干部对中央的统一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一些干部骄奢淫逸，生活堕落，贪污金额不断攀升。

有专家指出，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理想信念缺失，还表现在干部队伍中存在“两面人”现象：有的干部谈起理论头头是道，工作中却敷衍了事、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有的干部在台上道貌岸然，台下却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有的干部在大庭广众之下正襟危坐、一副正人君子模样，私下里却吃喝嫖赌样样“全能”。“这样的‘两面人’，是目前党内最危险的因素”，中央党校陈雪薇教授说，“这样的干部已经失去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信仰，失去了起码的党性。对于这样的‘两面人’，应该提起极高的警惕。”

从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可以看到，一些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党性不纯，已经危害了社会风气，影响到群众信心，削弱了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

中央此次强调党性，主要针对的不是一般党员，而是领导干部。从领导干部作风的根本性问题“党性”抓起，也表明了高层对于干部作风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认识高度。

——摘自《瞭望》

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定期“下访”

中央最近提出要求，各地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要做到规范化、制度化。同时，还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了解社情民意，推动中央决策部署，督导解决信访问题。

近年来，一些地方党政机关、一些部门连续实行“开门大接访”，很受群众欢迎。“开门大接访”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能及时满足群众要求，让干部更直接地感受到群众的愿望与情绪，为化解社会矛盾创造了条件，密切了干群关系；另一方面，也给一些基层经验、实际工作经验不足的干部，提供了做好群众工作，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

不过，这样的“开门大接访”，大都属于“一过性”活动。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需要长期关注，一些新问题又在接访后产生和出现，因此，开辟一个制度性的、常态的干群沟通渠道

非常必要。这是中央要求干部接访规范化、制度化，以及推动干部下访的重要原因。而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内外矛盾有可能交织重叠激化，更有必要让领导干部早作准备，随时了解社情民意，将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

尤其需要各地干部注意的是，干部接访制度化、规范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导向。此前，各地发展速度不一、矛盾积累不一，接待群众来访本是各地干部的“自选动作”。现在中央将其上升为“规定动作”，提出了“最低标准”，既说明各地矛盾积累已不容忽视，更要看到中央狠抓干部作风、端正执政理念的政治追求。

——摘自《瞭望》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强调 文风话风上的形式主义是社会公害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在1月19日《学习时报》上撰文说，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文风话风上来个思想解放。

文章认为，文风、话风乃至会风中形式主义严重，非自今日始。早在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太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六、七年，我看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有些方面甚至也可以说越来越严重。例如：有些文章和讲话又长又空又重复，充满人尽皆知的大道理，没有多少有的放矢的具体话和新话。有的则既不摆事实，又不讲道理，充满“必须”、“一定要”，居高临下，套话连篇。

还有些文章和讲话不在琢磨事儿上下工夫，专在琢磨词儿上下工夫，充满四六句、顺口溜，但都是一些表面文章，“好听”但不管用。

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束缚自己的思想，二浪费别人的时间，实在是一大社会公害。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并且从自己做起，努力改进文风话风，在这个问题上来个思想解放，使我们的文章和讲话从泡沫文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兴讲真话、讲实话、讲短话、讲明白话、讲管用话、讲自己话之风。

——摘自《学习时报》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指出 应警惕“政改麻木症”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撰文说：有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上有“改革焦虑症”，那么，在对待政治体制改革上又有哪些“病症”？最近一个时期，至少有一个问题比较明显，我把它叫做“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值得高度警惕的思想“病症”。

这一“病症”有个基本症状，那就是，忽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没那么必要、没那么迫切了；忽然觉得过去的政治体制没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优越性了。直接致“病”的因素，是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国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这似乎暗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

和这种“麻木”有关的，不只是观念、认识。还有一种思维方式，也值得提及。这种思维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满足于在过去僵化、封闭的思维模式中打转转，连战争年代的话语都不肯改一改，把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变成了一种自娱自乐、自我陶醉，拒绝吸收一切他们认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然更拒绝使用国外学者发明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排斥一切、拒绝任何变革的心理。比如“公民社会”、“宪政”、“政党现代化”这样的概念，他们无疑是一概排斥的。有时还把这种排斥用到学术讨论、评奖等等之中，颇有以权谋私之嫌：谁的学术著作中涉及这些概念，一律“一票否决”。笔者敢肯定，对我们党应当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观点，他们也是反对的，只是中央讲了话，不好再明着否定而已，只好转而批判所谓“普世价值”。

政治体制改革真的不那么紧要了吗？非也。恰恰相反，随着改革的深入，浮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都和政治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政治体制不改革，不但这些问题无法解决，还会继续积累下去，汇成危机。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试举几例：

例如，我国将拿出总数为 4 万亿元的资金，应对金融危机。4 万亿资金怎么用？很显然，这不

光是对党和政府调控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政治体制的考验。一系列事实表明，由于我国历来权力高度集中，部门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金。国家有了钱，这是好事；但是，没有一套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寻租的行为。千军万马“跑‘部’‘钱’进”的现象，不就是体制不健全的直接后果吗？众所周知，在 4 万亿投入的决策公布以后，“跑‘部’‘钱’进”已在走向高潮。不难预料，这 4 万亿在用来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弄不好也为腐败现象泛滥提供了沃土，加重了政治风险。

又如，这些年来，干部制度改革方面出现了不少探索，有些成果卓有成效。但是，不知为什么，对最本质的授权民主问题，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加以回避，因而总体上缺乏推进的力度。虽然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乡镇领导班子直选尝试，不但老百姓积极性高，而且成果显著，我们却宁肯用“公推公选”来代替它。

再如，我们不能不承认，既得利益问题已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一些既得利益已经发展到了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地步。这种情况，任其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文章说，在这个方面，笔者赞成“少说多做”乃至“只做不说”的方针。只要执政党还是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责任感的党，就应当义无反顾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不给那种误党误国的“麻木症”以任何市场。

——摘自《南风窗》

医保三年内覆盖九成人

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 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会议决定，为落实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从 2009 年到 2011 年，重点抓好五项改革：

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3 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 90% 以上。2010 年，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120 元，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

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调整管理机制和供应保障体系，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

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县级医院（含中医院）、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和困难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制定并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 2009 年开始，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增加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经费标准。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

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今年开始试点，2011 年逐步推开。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监管机制，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今后 3 年的阶段性工作目标是：到 2011 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可及性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明显缓解。

——摘自《北京晨报》

事业单位养老试点改革

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 5 个试点省市今年正式启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而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

此后，互联网上一篇题为《广东高校教授提前退休潮》的帖子引发热议。帖子说，工龄超过 30 年的高校员工，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都可申请提前退休，退休金按老办法 4000 元 / 月以上；若不申请提前退休，退休金可能只有 1800 元 / 月。

对此，广东省一些参与方案的权威养老保险专家表示，相关改革将有多项措施保证平稳衔接：

——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配套推进。从 1994 年开始，广东很多事业单位就已经按企业养老保险办法参保。还未纳入的主要是公益性的学校及医院两大块，其养老保险如何改革，首先要分类明确哪些继续向公务员靠，哪些则向企业靠。

——保证平稳衔接。新办法实施前已退休的“老人”，待遇照旧发放不受影响，可能受影响的是那些已经在事业单位工作而又尚未退休的“中人”。为此，在基本养老金计发上，将有“过渡性养老金”这一项。比如，可以考虑采用“补差”的办法，与旧办法的待遇差多少就补多少；也可以在计发时乘上一定“系数”，与其原工作年限挂钩，原工作时间越长，将来发得就越多等，不会出现改革后待遇骤降的问题。

——通过“职业年金”等保持待遇总体不降。“职业年金”类似于“企业年金”（即企业补充

养老保险), 运作得好, 其待遇还可能超过目前水平。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教授认为,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着眼点不是降待遇、“甩包袱”,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可靠的养老保障制度。

——摘自《中国改革报》

政府机关应习惯民间摄像头

节后上班第一天, 扬州一民间团体到政府机关门前手持摄像机逮上班迟到者。这一做法得到许多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诚然, 和其他企事业单位一样, 政府机关也有自己的考勤规章制度。但是, 相比有着明确生产经营及经济目标的企业, 政府机关的特点却大为不同。对于企业而言, 其生死存亡与规章制度是否到位密切相关, 因此, 企业对于规章制度的执行往往有着主动自觉的约束力, 不少企业不仅对上班迟到有着严格的规定, 更具体到迟到一次罚款 50 元等细则, 这一点从上班族们的步履匆匆与焦急神情中, 都不难看出。相形之下, 政府机关尽管也有关于迟到早退的规章制度, 但既无约束, 更无罚则, 规章制度常常成为一纸空文, 也就并不奇怪了。

事实和经验表明, 公务人员对于规章制度的遵守, 如果仅仅寄希望于政府机关的内部监督, 并不可靠。政府机关作为财政供养的机构, 既然公务人员是纳税人出钱聘请来提供公共服务的, 那么, 纳税人其实正是公务人员的“老板”。老板监督职员天经地义, 这样说来, 民众到政府机关门口手持摄像机逮上班迟到者, 不仅不是多管闲事、侵犯隐私, 而恰恰是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权利的回归。当然, 这里面也有公民遵守政府正常工作秩序和相关法规的问题。

——摘自《中国青年报》

官员压力来自“潜规则”

近日, 人民论坛杂志联合新浪网、人民论坛网展开干部压力调查, 共有数千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普通群众参与调查。

对于“领导干部面临的压力大不大”, 78.61%的受调查者认为没什么压力, 干部比企业家、白领、农民工等群体压力小得多; 12.08%认为大; 9.31%认为比较大。

据人民论坛杂志对全国 100 多位干部心理健康问题调查, 80%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 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发展与责任等压力被形象地称为干部背负的“大山”, 使他们常常“夜不能寐”。

对于“领导干部的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47.7%的受调查者认为来自上级考核、政绩竞赛、升迁调动等升迁压力; 38.06%的受调查者认为来自迎来送往等公关协调、应酬交往的人际关系压力; 其他依次是行政问责带来的危机感, 应对利益、情色等诱惑的压力, 来自公众诉求的社会压力、舆论压力, 增强本领、跟上时代的学习压力。

——摘自《人民网》

危机来了, 文化咋办

时下有一说法, 经济出现危机之日, 正是文化繁荣昌盛之时。此说根据之一, 是 80 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 当此时也, 美国经济也是一团糟, 然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 却是出人意料地一片红。首届奥斯卡颁奖礼, 恰恰就在经济最糟糕的那一年隆重举办, 而此后其不但崛起于美国而且走红于世界。

再举一例, 说的是 10 年前那场来势汹汹的亚洲金融危机, 虽然整惨了韩国经济, 却恰恰激起了一股来势不小同样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文化“韩流”。至于日本“动漫大国”之确立, 确也与其经济的波折与萎靡不振有关。这说明经济出了危机萎靡不振, 文化反倒是一个契机, 反而会乘势而上, 蓬勃发展起来。

以“理论”分析之, 原因大抵有三。其一, 经济萧条不振, 恰恰需要给人以文化的心灵鸡汤。其二, 经济环境的坎坷与挫折, 正好为文化产品提供了难得的创作素材。其三, 物质产品生产大都必须以物质资源消耗为前提, 而精神产品则几乎用不着消耗物质资源。这也是经济危机之时并不妨碍文化产品生产的一个客观原因。

危机来了, 文化咋办? 这课题无可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部分官员学历渐高能力渐弱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出席十届省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时，针对转变干部作风问题指出：

时至今日，一些党员干部无所用心、敷衍塞责，陷于文山会海，忙于迎来送往；满足于当“传声筒”、做“中转站”；不是扑下身子干实事，而是眼睛向上谋“位置”。

有的干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改革创新的办法不多；有的干部面对困难存在懒汉思想或畏难情绪，好干的事情争着干，能拖的事情尽量拖。

现在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

要切实做到尊重群众而不是轻视群众，亲近群众而不是疏离群众，帮助群众而不是折腾群众。

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突出反映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现在交通、通信方便了，联系群众的途径多了，但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接触群众反倒少了，这是值得警惕的。

干部要经常掂量掂量“你是谁，为了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政策不出台，群众不支持的措施不实施，群众不满意的干部不重用。

领导干部要多交诤友良友，净化自己的“社交圈”，做到慎独、慎欲、慎微。多读读书，听听高雅音乐，成为精神上的贵族。物质消费太多了，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精神消费才是一种享受。

——摘自《广州日报》

沈阳：信访提前介入大事

在沈阳，如果某个重大建设或拆迁项目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上访，信访部门有权说“不”。沈阳市去年下半年建立信访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以来，已有包括某公司土地动迁等 4 个在建项目被叫停。

政府拥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利益追求。从理想的状态来说，所有政府部门都应该代表公共利益，追求公共价值。但是，现实中，往往是不同的群体和团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公共的组成多种多样。政府的重要作用是平衡各方利益，使得各方能够实现“双赢博弈”。这就需

要在政府的公共决策过程中，各方都能够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协商、妥协和对话取代矛盾、冲突和对抗。

一些群体性信访，究其本质而言是民众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维护，尤其是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包括公共决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同样，要防止群体性信访的发生，减少社会的安全稳定风险，从根本上来说要维护民众权利，尤其是从制度上和程序上维护民众权利。沈阳信访部门的做法，表面上看是为了通过行使否定性权力来减少群体性信访的发生，但其本质是维护民众权利的体现。

——摘自《新京报》

杭州市政府制度化实施“开放式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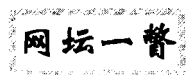
杭州市政府日前公布实施《杭州市人民政府开放式决策程序规定》，明确提出要对市政府的拟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等重大行政事项实行开放式决策，确保市政府决策基础的广泛性、民意表达的直接性、决策民主的有序性。避免权力寻租、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拍脑袋决策的发生。

根据杭州市政府的规定，实施开放式决策的事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重点专项规划，重要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草案等。

杭州市政府提出，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在将决策事项提交市政府审议前一般要按下列规定事先征求意见，未经充分协商的事项不得提交市政府决策。

杭州市政府指出，普通市民可选择申请参加互联网视频连线发言或列席会议等方式参与市政府常务会议。杭州市政府常务会议都将通过“中国杭州”政府门户网站、杭州网和杭州华数数字电视等进行全程直播，并与市民代表通过互联网视频连线开展互动。

——摘自《新京报》



世人热议“中国模式”，中国更应自警自检

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之中。“中国模式”

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决不可自我膨胀，自夸“盛世”。当此危机降临之际，正是我们自我警惕、自我检查之时。度过危机为当前急务。尤其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

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中国探索出了一条既融入国际社会、又自主发展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以其独有的竞争力、效率和适应性愈益吸引着世人目光。

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被称为金融海啸，人人谈“啸”色变，唯独有一特殊现象，就是连西方许多人都重看中国的发展，都在争说“中国模式”，认为“一场金融海啸反使‘中国模式’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并拿“中国模式”来和其他发展模式(包括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比。

对于“中国模式”，不少有见识的西方人大都欣赏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就是先使政治稳定下来，然后大胆发展经济，创新经济体制，甚至不怕采用某些资本主义的方式推进经济的发展，经过一场激烈持久的斗争，最终使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位西方评论家就此回顾前苏联的先政治后经济的改革时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协作之下，甚至删去宪法第二条，即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这就为索罗斯等世界金融巨头制造了很大的温床”。

但是，中国的经济先行并不是政治丝毫不动，不给经济提供助力，事实并非如此。诚如一位中国青年评论家俞可平所说，中国是采取“增量民主”的办法，“增量民主”表征为渐进的积量变为部分的质变。这从基层普选和上层采取的某些使人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措施可以看出来。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情况各异的大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中国的市场有一个有效的保护层，这就是国家(国务院)有一个宏观调控市场的机制(当然要以有效率的政府为前提)，使之少受市场自发起伏的影响。

在评论中国发展模式时，最使国外学者们感兴趣并引起讨论的是关于民主的问题：没有西方式民主能否使经济得到发展？一场金融海啸和使世界瞩目的中国发展模式使人们重新反思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体会深切，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在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长期以来，美欧政客和舆论，一直意图以印度的“民主道路”把中国道路比下去，但并不如愿。2007年11月下旬，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一次演讲中强调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几天后，印度

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一次集会上，向印度政要热情推荐这个演讲还特别指出“希望印度能维持良好的民主机制，但民主也有缺陷”。早在2006年9月，一位俄罗斯经济学教授波波夫就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处方可谓背道而驰”。最近香港《镜报》月刊有一篇文章指出，西方一些政治人物总喜欢将“民主是普世价值”一语挂在嘴边，事实是否如此呢？当然，民主是一种非常正面的东西，没有人会否定它，但是民主有各种各样，说“西方式民主是普世价值”显然是言过其实。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最近也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文说，西方的民主价值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它既源于“启蒙思想”，也源于基督教教义，因此，在亚洲并不行得通。就以美国来说，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国自身的选举制度和民主形式早已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民主诉求，选民不能直接投票给自己属意的总统候选人，人民投完票后便一无所有，选举总是以金钱为主导并且充满伪善和贪婪。所以现在一场金融海啸促使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中国，他们注意到：“中国模式”既融入国际社会，又不依附西方；既借鉴吸取资本主义因素，又坚持独立自主道路；既促进顺势的发展，又显示逆势的承受力。民主的渐进，经济的高速，社会的稳定，日益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仅见之于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舆论中表现出来。

就拿渐进民主一项来说。2008年2月7日德国《新德意报》文章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不是抽象的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2008年2月，美国“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以上是所见所闻的一方面。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之中。关于这些方面，总括起来说，第一是认为中国在保持国内稳定的前提下对适合于自己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特点的民主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远景规划出来，相反，在这方面倒不时听到一些不协调的杂音；第二，在居民生活得到实质性提高的情况下，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遏制，改革不到位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

间以及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导致实质性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中面临严峻的考验，中国不能独善其身；第三，认为当今中国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外来敌对势力可以打败，“台独”、“藏独”、“东突”、邪教组织，都不足惧，唯一能够打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只有来自内部的腐败。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尽管近年来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权力私相授受、卖官买官等腐败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蔓延之势。许多腐败源于用人不当，监督不力。不能治人，焉能治国？

以上信息均来自权威报刊和官方网站

刊头题字：张甫雄 责任编辑：镇江市图书馆期刊部
地址：镇江市解放路 17 号
电话：84447365 邮编：212001
E-mail: zjtsghk@126.com